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吴宪

(山东中医药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直隶士绅;构成;特点;心态

[中图分类号] K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0)01-0121-03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在直隶蓬勃兴起,并在此形成整个运动的高潮中心,其间直隶士绅扮演着相当复杂的角色。因此,深入探讨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对进一步揭示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以及探究这一时期直隶的社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构成

关于士绅的界定,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众说纷纭。笔者认为直隶士绅主要有以下三部分人构成:第一,取得功名(进士、举人、生员即秀才)的未仕士子;第二,退职还籍的官僚;第三,因捐纳而获得某种职衔的工商业者等。

在以上三部分人中,又以取得功名而未仕的士子为主。直隶向为畿辅重地,处天子脚下,是晚清的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地区。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其在某些方面得到了清政府的特别关照。在科举考试中,它的官学额数高居其他各省之上,名列第一。这就使得直隶拥有较多的取得功名的士子。但取得功名的士子不一定就能做官,伴随晚清内忧外患的加剧,清政府为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大开捐纳、保举、军功等途径,而这些“捷径”又常限于富豪势要阶层。靠直接捐纳得官职,远比科举入仕更为便捷。直隶既不象湖南拥有众多因军功而致显的官僚,又因经济实力限制,通过捐纳获取功名也有限。因此,在通向仕途的漫长道路上,有许多士子终生不得入仕,只能以士绅身份在地方上活动。义和团运动后,时人评论说,“此次凡谋与洋人为难者,非进士,即举人,非举人,即秀才。从未闻无功名之士,能煽动愚民,为其效力者。”^{[1](P297)}而这些取得功名的士子,大多属“不得已之浅学人士”,他们“倾心教派,易于乱乱。此次拳党之中,此类人士为数甚多。”^{[2](P89)}所以在直隶士绅中,应以第一种情况为主。

二、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特点

在中国传统社会,影响人才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经济,一是政治。宋明以后,随着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西省份成为全国财赋的聚集地,因此人才荟萃于此,而影响直隶人才成长的主要是政治因素,政治都会所在,全国文化所聚,四方人才辐辏。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直隶士绅带有如下特点:

第一,政治保守。直隶为京师所在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与传统文化的灌输,使其不能像沿海沿江的省份那样,为新思想的萌生提供肥沃的土壤。有关学者对19世纪末各省士绅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其中在对各省士绅维持儒学道统的统计中显示,直隶士绅中维持儒学道统的比例是较高的,在全国排第三位。维持儒学道统与政治保守是紧密相连的,这决定了直隶士绅基本是站在统治营垒一边,并忠实地为其服务。在社会稳定时期,直隶士绅不但能充当联系国家权力与下层民众的桥梁,而且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柱石,许多纠纷因他们的调解而烟消云散。在保定,生员王泽世极善调解纠纷,所以他的老家各村庄很少有诉讼案件。^{[3](P15)}在天津,贡生杜咏南调解纠纷十分明晰,十余年来他所在的庄上竟无讼案。^{[4](P64)}但当社会出现动荡,特别是民众的革命运动完全指向统治阶级时,他们总会作出反应的。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太平军和捻军转战直隶时,直隶各地士绅积极响应清政府号召,大办团练,很多士绅不惜付出生命,拼死抵抗。在临涞关,监生宋遵信率领团练与清军共同夹击太平军,直至战死。^{[5](P344)}关于此类记载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思想闭塞。这与政治的保守是相一致的。士绅既为儒家思想所陶育,又陷在儒术统治的牢笼之中。其思想受着极大的束缚与挟制,再加上清政府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更加重了他们思想上的闭塞。“缘中国北方,若不开辟商埠,则华人与外人永无交通。”在这样传统思想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中,既缺少内部的思想交流,又缺乏对外信息沟通的渠道。士子在旧式教育下,多致力于章句贴括之中,对各种新学多未讲求,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也很少关注。他们生活在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头脑中充斥的是向科举登进的儒学,对社会变化和新生事物较难适应和接受,所以有人将他们称为“闭关派”。

但是,直隶士绅思想的封闭,在不同的区域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直隶南部和毗邻山东的地区,受政治的影响较小,外来信息也很难传播到这里。所以这一地区士绅的思想比直隶较发达地区更显封闭,排外意识也更强。他们在义和团运动中表现十分积极。据调查,衡水、武邑、冀州、阜城等地的义和团首领,大多数是由士绅充任的。涌现出了一批诸如渠成江(衡水县留仲)、景廷宾(广宗县)、田燮经(深州)、陈耀宗(邯郸县)等义和团首领。他们坚持斗争至最后失败。而在直隶中部环京、津、保三角地带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一地区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决定了该区域士绅的思想受政治和外界的影响较大。

第三,经济拮据。就士绅阶层而言,之所以为士绅,不是以其占有土地多少,而是以其有无身份,所以士绅中也不乏贫寒之士。“四民之中士最贵,亦最贫。……谚谓,举人为破家之子,亡命之徒。又云,举人老,盘川少,不虚也。”^{[6](P49)}《大公报》也曾为士绅呼吁:“悲哉绅也,痛哉绅也……读书之人不善逢迎,则保举无路;不善居积,则捐纳无资。”^[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士绅的经济状况。相对而言,南方发达省份的士绅经济状况要比直隶好些。当时报纸记载南方官绅之家,“喜营厦宇,门坤墙阙,焜耀争高。”又云“尝见北方富厚之家,类皆居卑陋”。^[8]太平天国后,直隶的学额总数虽居首位,但它与各省差距大大缩小了。原因在于经济力量薄弱限制了其对军饷的报效。直隶素称贫瘠,即使商品经济与市场较发达的地区也

难与江南的任何地区相比。直隶有些地区村落稠密,土地狭隘,颇有人满为患之感。“富者仅足养生,贫者多有纺织为业者。”^{[9](P520)}经济的制约,使他们对地方势力和基层社会的依存度较高,在争取实际的经济利益时,很可能与民众处于同一阵线。

通过对直隶士绅构成、特点的分析,我们对其已有一个粗浅的认识。但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伴随着社会心理结构的震荡和社会文化结构的冲突而进行。因此,不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心态进行剖析,就不能对这一时期士绅的状况有一个全面认识。

三、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心态

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是士绅的普遍心理。传统社会是个讲身份的等级社会,没有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高贵身份,说话办事都很难。士绅之所以在地方上享有种种特权,虽然与他们富有和出身望族有些关系,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科举及第。特别是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传统社会中,人们没有更多的出路,只能通过读书应试来改变自身的境遇。即使出身较贫寒也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民谚就说明了这一点。士子们习八股词章,寒窗苦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康有为请废八股后,一些八股士子骤然失业,甚恨康有为。其中“直隶士人至欲行刺”康有为,因为废八股无异堵塞了士人的登进之路。可见,直隶士人把“学而优则仕”视为自己的生命线。

“重农轻商”的心理根深蒂固。张仲礼对19世纪后半期各省士绅成员的经济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直隶地主身份的士绅所占百分比相对较高,经商的士绅则低得多。安徽和广东经商的士绅百分比最高,山西次之。这是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传形成的一种社会现象。又据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一书对纺纱等47种行业的统计,19世纪末直隶的商办企业寥若晨星,而这时,以江苏士绅张謇、陆润庠等为代表的一些南方士绅,相继创办了苏州苏经纱厂、苏伦纱厂等一批近代企业,风气渐开,与直隶士绅形成较大反差。民国初年,直隶视学在全国搞了一个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地区民风淳厚,人多务农不善经商,“宁农勿商”在读书人的心目中更是根深蒂固。^[10]

重道轻器。儒家经典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要求人们执著于对道的追求,而忽视、轻视对器的探索。形成了只重制举,不务实学,“轻自然,斥技艺”的心理,造成了“学”与工农商之间的畸形分工。直隶地处政治中心,深受这种道统思想的影响,士子除四书五经外,很少读其他书。当时北京的书店中,连世界地图都没有。到甲午战争为止的30余年间,江南制造局译的书总共只卖出13,000本。因此“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读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11](P18)}这种风气如同“紧箍咒”牢牢地束缚着直隶士绅,久之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如任县,邑无精致工艺;惟织布之业遍于旧境。”在望都县也存在“无他技能,耕田而食,织布而衣”的情况。^{[12](P521)}

以上三种心理是在长期封建社会的浸染、影响下形成的,直隶表现得最为典型,而东南诸省则大相径

庭。鸦片战争后,东南诸省在欧风美雨的拂润下,风气渐开,逐渐形成了一个受西方教育的新型士大夫群体。尤其是粤、闽、苏、浙等省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得风气之先,为新型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涌现出一大批社会和政治的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陈虬、冯桂芬等不胜枚举。正如时人所论:“北方地既贫瘠,于是士子无资向学,其孤陋寡闻,遂较南方尤甚。至于工艺之苦窳,商业之疲惫,尤非人力所能挽回,”这与“南方士人,户习新学,人思自强”形成鲜明对比。^{[13](P225)}

直隶的闭塞限制了士绅的视野,传统的心理又制约着他们的行为,但这并不排除采取其他方式谋求自强之路。特别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深深激发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情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来是传统士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时代变迁赋予其传统心理以新的内容。

忧国自尊与排外的心理。孙中山曾精辟地说过:“凡受官方影响愈小的人民,比之那些受影响较大的人民,总是对外国人愈为友善。”而直隶恰恰是受官方影响大的地区,且是未被划入势力范围的沿海省份,受西化的影响相对其他省来说是低的。所以忧国自尊与排外的心理表现极为典型,加之“近年以来,瓜分中国之事,为世界各国报纸最喜讨论之题目,复使中国上流阶级之自尊情感,深受刺激”。^{[14](P69-70)}所以在洋人大炮所轰不倒的内地传教区,就难免不遭受到这股恼火的反感情绪的反击。法国神甫在报告中说,“那些洗劫我们教会,拆毁我们教堂的人,无非是本地被煽动起来的已断了粮的灾民,他们的带头人还往往是当地的绅士。”^{[15](P229)}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清政府软弱的无奈,对帝国主义的愤恨,而这一切又无法在现有的统治集团内部和自身的努力下得到满意的解决。在经历长时间的压抑后,便蕴积了一种反抗力量,当这种力量遇到适宜的途径和机会时,就统统以排外的方式爆发出来。

【参考文献】

- [1]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 庚子国变记[M]. 上海:上海书店,1982.
- [2] [14] 中国史学会不编. 义和团(三)[M].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 [3] 李振祜(清)修. 保定府志(卷44)[M],1881.
- [4] 沈家本(清)等修. 天津府志卷44[M],1899.
- [5] 李鸿章等纂修. 畿辅通志卷239[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 [6] 冯桂芬. 校邠庐抗议[M]. 天津:广仁堂,1897.
- [7] 大公报[N],1904-2-4.
- [8] 申报[N],1883-10-16.
- [9] [12] 李文治. 中国农业史资料(第1辑)[M]. 上海:三联书店,1958.
- [10] 直隶视学编纂. 直隶风土调查[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 [11] 中国史学会不编. 戊戌变法(二)[M].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5.
- [13] 中国史学会不编. 义和团(四)[M]. 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 [15] 路遥主编. 义和团运动起源探索[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王云江]

The situation of gentry in Zhili province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WU Xian

(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he Boxers Movement in Zhili Provi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gentry. The paper makes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situation of gentry in Zhili Province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including constit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y to further explore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Zhili Province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try and Boxers Movement in Zhili Province.

Key words: gentry in Zhili province; constitution;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y